



中国精神中国梦 系列随笔之二

从“美国梦”看“中国梦”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说：“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能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 饶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终身讲席教授)

美国有个典型的说法,叫“美国梦”:一个赤手空拳的移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美国的环境中,获得某个方面的成功。

这个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体制对于个人发展的优越性。

我希望,本世纪的华人能创造一个“中国梦”:全体华人,不分地域、国籍,集体努力建设一个群体幸福的中国,以中国的实践为世界提供新的模式。

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回国:失去的是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获得的是以个人与群体共同幸福为自豪的“中国梦”。

在这个前提下,我也希望归国者和国内的人成为同志:摒弃以关系为导向的旧习性,建立以事业为导向的新文化,携手并肩共同探索新道路。

如果大家携手并肩,有可能以中国为基点推动人类进步。

我记得,“文革”末期,我生活的江西南昌连蔬菜都要定量,肉类已经极其缺乏多年,中秋月饼也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

现在的常见食品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通过中国人民30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远离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我相信,中国还能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进步并非无可挑剔,应该欢迎继续批评。比如,我回国后才知道现在有的大学政治课所要求的科目比“文革”时期还多,令人十分不解。显然,中国大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培养从政者,政治课更不能比“文革”时期还多。中国的缺点当然不止这一个。但是,正因为中国的进步有限,不如意处还有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毋庸讳言,许多人出国一个原因是以为美国代表人类发展的理想。这样的想法,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国的华人中大概不是少数。如果纵观世界历史,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可能: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基础,包容传统,结合中西的理性思维,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不同于受宗教极大影响的西方模式,一个也许优于西方的模式。

中国的缺点众目睽睽,好像从来不乏国内外的批评;中国的

优点,有些却没有得到冷静的挖掘。有位尚未回国的学者说:如果中国可以自由买卖枪支,将比美国乱很多。我想说:如果美国没有宗教,腐败和道德问题可能比目前的中国还多。一个不依赖宗教而建立了道德体系的文化,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就。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扎扎实实做工作。在国外批评不需要很多勇气,而且起的作用不大。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人能像梁漱溟、马寅初那样有脊梁。在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但不如在国内做得多。目前,还没有人能赶上“两弹一星”时期的科学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却为中国做出那么重要的贡献。

毋庸赘言,如果和西方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甚至很落后。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中国不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也可能在多方面超越西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方面。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中国也将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探索超出西方的模式。

中国还有很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尚未通过艰难的坎,既有勇气问题,也有具体怎么过的问题,但

是,中国已经从近代最严重的内忧外患(日本入侵、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中国还有人权问题,但是中国近年只有进步没有退步,而布什总统期间,美国的人权退步到践踏几十年前签订的《日内瓦公约》;奥巴马也慑于国内压力,并没有就当年美国国家对联合国撒谎、对国际公约的肆意曲解向伊拉克人民、向世界道歉。

我认为,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根本是优点;中国不热心侵略是优点;中国不依赖宗教来约束人民是优点。中国的诸子百家,是民主、平等、和平、理性的探讨。没有宗教吓唬人,没有强求他人信自己才能得救,没有故意以谎言、欺骗为基础。在美国的生活告诉我,宗教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影响,消失将相当缓慢。宗教的负面影响去除的过程,会慢于中国现有的主要问题和各种大毛病的改变,而且会慢很多。海外华人并不能影响美国宗教副作用是否消失、多快消失,而回国来参与工作,却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说:“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能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名家“半月谈”

中国梦为什么能够凝聚中国人

□ 冷溶(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中国梦是国家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中国道路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上。中国梦不仅仅是理想、是目标,也是现实,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梦的实现,要体现在解决老百姓关心的一件一件具体事情上。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这个梦的好处,是真实的、可以实现的,感觉到这个梦和他们有关系,愿意为实现这个梦去付出、去奋斗。由此,这个梦也才能真正成为凝聚人民、激励人民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

(据《人民日报》)

中国梦与家国情怀

□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家梦”的结合:“国”和“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语言联系着民族的文化血脉。汉语“国家”一词由“国”和“家”组成,表达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独特感悟。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维和生活方式,例如“舍己为家”、“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的儒家信念。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可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关注国运的昌盛,认为国家的安定富强与个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这种感受也是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国破家亡”悲剧后形成的集体历史记忆。

(据《人民日报》)

实现中国梦 要坚持“五有”

□ 辛向阳(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阐明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实现中国梦,需要坚持“五个有”:有路、有魂、有底、有人、有备。有路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有着中国道路的支持。有魂是指中国梦的实现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有底是指中国梦的实现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基础和可靠保障。有人是指中国梦的实现有着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有备是指中国梦的实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须时刻准备迎接挑战。

(据《北京日报》)

编辑:徐静

“中国梦”与理想的追求

“中国梦”就是在中华民族中建立起最大限度的共识,从而能够把所有炎黄子孙最广泛地整合起来的基本条件。“中国梦”始终是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其基础和前提的。我们应当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的情怀和态度,去做“入世”的功夫。

□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怀有共同理想的人,才能真正地走到一起。共同的梦想,才能使人们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梦”就是在中华民族中建立起最大限度的共识,从而能够把所有炎黄子孙最广泛地整合起来的基本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淀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又百折不挠的民族自晚清以来的多少期盼与希冀!

读懂“中国梦”,就需要参透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虚实相生”的道理。老子有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第二章》)显然,在老子看来,所谓的“有无相生”,乃为千古不易之理。“有”为“实”,所谓“实有”;“无”为“虚”,所谓“虚无”。“有无相生”其实也就是“虚实相生”。老子还说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老子·第十一章》)这句话蕴含的道理是:车轮子固然需要辐条,这是实,但还要有放车轴的空心,这样方能取得车子的效用;陶器是中空的,所以才成为器皿,能够盛东西;屋子要有门窗,方能住人,才成为屋子。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它正是虚实的

结合。孟夫子固然说过“充实之谓美”,但他依然强调“大丈夫”要“养浩然之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一个事物的成就,离不开形式和质料,两者缺一不可。形式是空洞的,是虚的规定;而质料是实的,但却是不定形的。因此,离开质料的形式,或者是缺少形式的质料,都无从形成特定的事物。这实际上也是强调“虚实相生”的道理。

然而,历史往往是在片面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务实的时代,是一个去圣复神、入世还俗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梦”的时代。“世俗化”趋势把每一个现代人都毫无例外地抛入了庸常生活,人们都变得很“实际”,不再追求任何超越的东西,而是仅仅满足于当下的感受。人们执拗地认为只有这才是真实的,它极大地钝化了我们曾经恪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这固然真实无比,但同时也不得不面临一种危险,那就是走向平庸和恶俗。“物质巨人、精神侏儒”,正是现代语境中的畸形人格。现代性就像“温水煮青蛙”,使人们的心灵在温柔中“死”去,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沉沦。当今时代流行的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打破了文化精英或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使得所有人在文化的分享中拥有平权地位,但也带来了文化的粗鄙化和肤浅。“玩世不恭”和“怎么都行”是两大

“现代病”。前者缺乏真诚,一切都沦为调侃和逢场作戏,无论是对生命还是对生活。后者则是丧失选择的尺度而沦为任性,只能是“跟着感觉走”,对于是非对错缺乏起码的判断力,甚至走向相对主义。说到底,这都是因为“一些现代性的酸”腐蚀掉了今天的人们内心中的那份理想。人们喜欢沉湎并陶醉于声色享乐,以至于“娱乐至死”、“躲避崇高”、解构理想,一时间成为时髦。

这或许是任何一个处在现代转型期的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现象,因为现代化过程总是会伴随着类似的情形。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另外一层特别的含义,那就是对过去那个“乌托邦”时代的反叛。今天的我们在心灵上的无家可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乌托邦”幻灭之后的一个历史后果。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症结是太“实”,缺乏一点空灵。要知道,没有理想,人们就不可能“诗意地栖居于世”。离开了空灵,人们就有可能被窒息而死。常言道“做人要大器”,一个民族也要大器。印度有句箴言,叫做“不要在今天的祭坛上宰杀明天的机会”。我们之所以犯短视的错误,就在于缺乏足够的远见,往往陷入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误区,它使我们丧失掉了筹划未来的能力。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是终究走不远的。同样地,一个缺乏远见的民族,也不会拥有

真正的未来。远大的胸怀、超然的眼界,宏伟的气魄,归根到底都离不开对于理想的秉持和坚守。

崇高是有尊严的事物所特有的性质。走向崇高,乃是人不断地实现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而只有在理想的引导下,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向崇高。在一定意义上,理想追求是我们获得文化免疫力的条件。它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肉体的羁绊,从而把自己升格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人格意义上的“人”。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同生物学本能妥协,同自己的肉体欲望妥协,从而不可避免地同动物式的生存沉沦,也就无从得到自我救赎。我认为,这正是理想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理想以及对于理想的笃信和执着,才能使人们获得免疫力,从而有一种孤往精神,能够在各式各样的诱惑面前拥有足够的定力,以应对时代的种种挑战。

当然,梦想应该是理想,而不应该是空想。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能没有“梦”,也不能只有“梦”。太“实”不行,太“虚”也不行,关键是要寻找到某种恰当的均衡。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智慧,也是历史对我们智慧的考验。“中国梦”始终是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其基础和前提的。我们应当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的情怀和态度,去做“入世”的功夫。